

# 3年合伙骗2000万元 1个棚改项目“放倒”18人

## ——四川查处多起套取征地拆迁款案的背后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吴光宇

一些基层干部与村民勾结,3年内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金高达2000万;一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就“放倒”18人……近来,四川查处多起基层干部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案件。“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 一线工作人员合伙犯罪

2015年4月,一封反映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阿署达村民民事纠纷的举报信,引起东区检察院反贪干警注意。顺着这一线索,该村涉及32人的非法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窝案浮出水面。

案件共涉及5名国家工作人员、3名受委托公务人员、8名村社干部以及16名村民。涉案金额从1万元到100万元不等,共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2000万元。

阿署达村征地拆迁中的问题并非孤例。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统计数据 displays,今年上半年,四川共查办涉农村土地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职务犯罪108人,占上半年查办涉农扶贫领域总人数的23%。

记者调查发现,被套取的补偿款往往数额较大,一线工作人员合伙犯罪。广元市利州区解家岩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涉案的村组、社区、街道办、拆迁办共18名工作人员被一网打尽,18人受到党纪处分,7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缴资金450余万元。

套取的资金大部分被个人鲸吞,部分被挪用。在解家岩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望江社区干部刘某某采取“乾坤挪移”的手法,先后挪用集体补偿款79万

元,用于个人日常开支和借给他人,甚至放起了高利贷,谋取高额利润。

### 干部村民“搭伙求财”

记者调查发现,多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如出一辙:基层干部与拆迁户串通一气,通过虚增土地面积和地上附属物等方式套取拆迁补偿款,获取高额补偿。

——虚增征地拆迁面积炮制地块。反贪干警在调查阿署达窝案中发现,2012年进行攀钢尾矿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时,部分土地已被尾矿库的水淹没,但很多村民都称家里有“水下面积”。由于“水下面积”无法实地丈量,一些村民便将工作组请出来吃饭拉关系,还让村社干部写证明、盖章,在测量土地时编填数字。其中,村民起加才就勾结攀枝花市东区土征办工作人员张世梁、四社社长杨元平等,虚增10多亩“水下面积”,骗取土地补偿款37万元。

——虚列征地项目附属物。按照规定,征地项目附属物属于重点补偿对象,部分基层干部及工作人员无中生有,在被征地块上虚列无主坟、鱼塘、林木等附属物,骗取补偿款。

都江堰市蒲阳镇某村原村支书杨某某伙同该村原副主任卢某某等人,利用协助拆迁的职务之便,制作虚假拆迁赔付资料虚列树木、竹林等地上附属物,套取补偿款30余万元。在阿署达窝案中,拆迁组工作人员黄平还伙同杨元平、村民蔡有忠冒领无主坟,骗取补偿款8万元,除5000元用于迁坟外,3人各分得2.5万元。

——谎报拆迁户口信息虚报户数。个别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利用认定、审核、统计拆迁对象户口信息的职务便利,故意错报拆迁户数,瞒报户口变动情况,甚至虚报无房、无户的“空挂户”为拆迁对象。绵阳市安县花菱镇某村一组原组长张某在接受该镇政府委托负责统计该组户数时,接受请托,将不符合规定的农户申报为拆迁户,收受贿赂7万余元。

### 征地拆迁流程漏洞多

采访中,纪检干部和反贪干警表示,征地拆迁领域的“蝇贪”“蚁贪”问题频发,既有当事人法纪意识淡薄、拒腐防变能力差等主观原因,但也暴露出征地拆迁过程中管理体制、权力运行、信息公开、监管机制等方面的短板。

多起案件的征地流程中,丈量测算、建筑附属物统计评估、权属确权认定等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几乎全凭拆迁工作组人员的经验进行操作,缺乏职能部门的专业人员实施和监督;拆迁人员测量面积和计算补偿金额完成后,工作人员并不需要立即在调查表上签字,调查表也无需立即存档。在与拆迁户签订补偿协议前,调查表都是由工作人员暂时保管,篡改数据十分容易。

按照规定,补偿款的发放应当依照严格的流程。以阿署达窝案为例,首先应由土征办的征地拆迁工作组负责丈量、记录,并与拆迁户签订补偿协议后,报土征办审核。审核通过后,再报财政局,由财政局依据协议核实拨款到

银江镇,之后再再将款打入拆迁户的个人账户。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数据的测量、审核、复核工作均由拆迁工作组来完成。资料收集、复核、统计、征地拆迁补偿面积的认定等多个基础工作环节全部集中于一人。

根据四川省的相关规定,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应当做到项目、审批、程序、标准、方案、兑现等公开。但在多起案件中,公开的仅是宏观政策,具体的征地面积、补偿标准、补偿金额等均未公开,为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留下了空间。

多位纪检干部和检察干警表示,当前各地征地拆迁补偿的政策规定还不完善,土地权属的确认、青苗或附着物的清点、补偿标准的确定等关键环节还存在盲区大、漏洞多等问题。

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卢建军建议,基层需尽快制定严密的工作流程,明确划分参与征地拆迁补偿工作人员的责任,规范征地分类、勘查丈量、资金发放等关键环节操作流程;构建主管部门对征地拆迁部门、征地拆迁部门对参与人员、参与人员之间的监督机制;准确、及时公开征地拆迁面积补偿标准、补偿金额等内容,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四川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特别是脱贫攻坚领域内的相关问题,四川将进一步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切实增加群众的获得感。



视觉热点

80年前,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四川南部县是嘉陵江战役的战场之一,在这个昔日的红军长征地中,记者日前发现一个“隐秘”在山中的“红军村”——南部县升钟镇张家嘴村。

从南部县城出发,驱车约两小时进入张家嘴村。沿途沟深林密,道路曲折。进入村口,一个“红军村”的标牌格外显眼——这是村民自己立的一块牌子。

由村口上山后再迂回下山,记者看到一排排川北民居风格的房屋。在一栋刚翻新的木楼处,“张友民”故居的标牌挂在大门之上。

不过这个“故居”还住着人,就是张友民的后代。南部县党史办资料介绍,张友民是升钟寺起义的领导人,此后是川北工农红军总指挥,这支红军队伍也是四川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

1932年11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南充中心县委和阆南县委组织领导南部县升钟寺、保城庙一带的农民,举行了一次震撼全川的武装起义。先后参加起义的农民、乡村手工业工人以及国民党士兵共约5000人。

起义之后,多路敌军围攻。张友民只得在组织安排下,分散突围。为了迷惑敌人,他把香朝自己脸上扎,变成麻脸。根据地下工作需要,他最终转移到阆南杨森部任炜章旅长的部队中,此后又策动了该部队起义,参加红军。1933年2月,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师,张友民任参谋长。

69岁的张子洪是张友民的孙子。在今年以前,他一

直都不知道爷爷的埋葬之地。

今年初,张子洪才知道爷爷埋葬在巴中市通江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一位到外地的老乡说,他在烈士陵园里看到了张逸民的名字,南部人,独立师参谋长。”张子洪一听,就知道这是爷爷。因为爷爷原名张尚德,改名张友民,又名张逸民。

今年初,张子洪与村党支部书记敬正山、已退休的原县文广局副局长邱文品等一行,来到通江县王坪村的烈士陵园。

# “隐秘”山中的“红军村”

□新华社记者 周相吉

“见到那个墓碑,张子洪是老泪纵横啊。”邱文品说。陪同张子洪一起去的,还有当地几个村民。村民们说,张家嘴村是典型的“红军村”,在革命年代付出过巨大代价。

在张子洪家里,儿子张青林从堆杂物的屋里还找到了两个红缨枪的枪尖,不过早已锈迹斑斑。他说,这是从屋后的水沟中清理出来的。而这个水沟,曾是一个假酿酒作坊的旧址。

“奶奶提过,爷爷他们经常在里面开会,一旦有人路过,他们就假装酿酒。”张子洪说,入党宣誓也经常在那里。而村口的一间私塾,也经常成为爷爷的秘密

活动地点。

在升钟寺起义失败之后,国民党军对张家嘴村进行搜索。张子洪说,奶奶先后在山上“五门洞”及庙里躲了1年半,才逃过一劫。但是村里200多间房屋被国民党军烧的一干二净,几十人被杀。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途经升钟寺地区。经宣传动员,广大贫困农民踊跃报名参加参军,人数超过3000人。曾在该地区分散隐蔽的游击队扩编为游击大队,后又改编为红军升钟寺独立师,汇入长征队伍之中。

张家嘴村民张加宏说,不能忘记这段历史。“这个村就是名副其实的红军村,我们自己要保护好。”

去年春节,这个村1社、2社在一起吃团年饭。期间,有人提出要集

资保护红色遗址,大家激情很高,纷纷慷慨解囊。在外地创业的张加鹏就直接出资2.5万元。那天,两个社共同捐资了10余万元,用于修缮村口的私塾——那是张友民念书的地方,也是后来开展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

“这里有‘红军洞’、验枪炮的龙潭,红军有真人真事。整个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外界并不清楚。”敬正山说。

如今,这个村的道路已硬化成水泥路。村民们的想法是,希望这个“隐秘”山中的“红军村”让更多的人知晓。